

季刚先生

“故里”

季刚先生

季刚先生生平及其著述

黄焯

黄焯

黄焯

编者按：黄侃(字季刚)先生(1886—1935年)是我国近代著名学者和文字音韵训诂学家，早年曾师事章太炎先生。章黄二人为清代小学的殿军，其成就已为世所公认。黄侃先生著述甚富，但因早逝，故所著书生前多未得刊布(已刊者仅《文心雕龙札记》《黄侃论学杂著》二种)。近年来我校中文系教授黄焯先生不顾年高体弱，孜孜不倦地整理编撰其叔父遗著。目前已有数种，如手批《白文十三经》、《文字声韵训诂笔记》、《尔雅音训》、《说文笺识四种》等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问世，在学术界影响颇大。为了使更多的读者对黄侃先生生平及著述作全面了解，我们特约黄焯先生撰文介绍，现刊载于此，以飨世之治斯学者。

季刚(侃)先生为翔云公季子。公以二甲进士，历官至四川按察使。清光绪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(公元一八八六年四月三日)，先生生于成都金玉街三道会馆。三岁即从江叔海(瀚)先生问字，初授《论语》，每次才四、五句，方一上口，即能背诵。四岁随翔云公游武侯祠，壁悬联语甚多，先生一览，便默识不忘。公问能记住几句否，先生即朗声背诵数联。人以其早慧，皆呼为圣童。五岁随公还居蕲春。次年公往南京，就尊经书院山长，值家用缺乏，奉生母周孺人命寄书白状，因于书末缀一诗云：“父作盐梅令，家存淡泊风。调和天下计，杼柚任其空。”(翔云公曾署四川盐茶道)翔云公后还武昌就两湖、经心、江汉三书院山长。先生十一岁时，曾随公至武昌。光绪二十四年戊戌(公元一八九八年)，先生年十二，翔云公患恶性疟疾卒于家，年七十九。公于清咸同间，以文章显名，遗著有《学易浅说》十四卷，《群经引诗大旨》二卷。《实其文斋文钞》八卷、《诗钞》六卷、《祥人诗续钞》十二卷。先生少承家学，读书多神悟，为诗文下笔即成。自启蒙后，续得江叔海诸老宿训诲。家有藏书，读经而外，复纵览诸子史传记，故其学得早成。十五岁应试入郡庠(时称秀才)，十七岁入文普通学堂肄业。

先生生于亡清之末，自甲午败于日本，庚子八国联军陷北京，国势日见危弱，尝怀愤慨。十四岁时读王夫之《黄书》，始识春秋严夷夏之防，由是排满念起。时与县人田桐(梓琴)同学，又与黄安董用威(必武)、广济居正(觉生)相识，于是日相与密谋覆清之事。张之洞时替两湖，以先生为故人子，又爱其才，不欲加谴，遣赴日本入早稻田大学。章君太炎于癸卯岁(一九〇三年)以苏报案，系上海英租界巡捕房狱，判处监禁三年。丙午五月出狱，孙中山遣人迎赴日本，入同盟会，主民报社。时中国留学生聚居东京者几逾万人，竞赴章君门下请业。先生一日随众往谒，见壁间大书四语曰：“我若仲尼出东鲁，大禹长西羌，独步天下，谁与为偶！(东汉戴良语)”既退，颇疑章君俯视一切，难与接近，不欲再往。后，章君见先生所为文，大奇之，即以书约见。书辞有“知君为天下奇才”之语，自是尝造章君之门，并投文请益，且共筹革命事。是时先生已加入同盟会，并以运甓、不佞、信川诸笔名写《专一之驱满主义》、《论立宪党人与中国国民道德前途之关系》、《释侠》、《哀太平天国》、《哀平民》等文。是年(一九〇七年)冬，先生将回国省亲，往告章君，章当谓先生“务学莫如务求师，回顾国内，能为

君师者少，瑞安孙仲容先生尚在，君归可往见之。”先生未即答。章君徐曰：“君如不即归，必欲得师，如仆亦可。”先生欣然起，次日执贽往，叩头称弟子。自是日相追随，所学益进。章君曰：“常言学问进展，如日行千里，今汝是一日万里也！”

戊申春，先生生母周太孺人病甚，慈母田太夫人电召君回家侍疾。行时，章君以所著《新方言》为赠，并题辞其上，各致勉励之意。

归国后，章君致书上海国粹学报社，略称：蕲春黄侃学问精博，言必有中，每下一义，切理厌心，故为之介绍，愿贵报馆加以甄采，必能钩深致远，宣扬国光云云。

先生还家后，五月，周太孺人逝世，先生一恸几绝，自是闭门养病，谢绝人事，间一操笔，写定《春秋名字解诂补苴》诸稿。时清廷方严捕革命党人，探知先生家居，急命吏捕致之。县役在途，先生始仓皇出奔，再潜走日本，与章君相依。先生事母孝，思母甚切，倩苏曼殊（元瑛）绘梦谒母坟图，自为记文。章君题其后曰：

蕲州黄侃，少承父学，读书多神悟。尤喜音韵，文辞淡雅，上法晋宋。虽以师礼事余，转相启发者多矣。颇好大乘，而性少绳检，故尤乐道庄周。昔阮籍不循礼教，而居丧有至性，一恸失血数升。侃之事母，若与阮公同符焉。余是以是士行不齐，取其近真者是。若其清通练要之学，幼眇安雅之辞，并世固难其比。方恐世人忘其闳美，而以绳墨之论格之，则斯人或无以自解也。老子云，常善救人，故无弃人。余每以是风侃，亦愿世之君子共谕斯言。 章绛记。

先生续居日本二年，为文字鼓吹革命，祇以民报被封禁，未得披露。据先生所撰《太炎先生行事纪》云：“日本政府受言于清廷，假事封民报馆，禁报不得刊鬻。章先生遂退居，教授诸游学者以国学。其授人国学也，以谓国不幸衰亡，学术不绝，民犹有所观感，庶几收硕果之效，有复阳之望。故勤勤恳恳，不憚其劳。弟子至数百人。”

庚戌初（一九一〇年），先生友人有人在鄂图大举者，促归国定计，先生即返国。惟审度情势以为时机未熟，不可轻动，嘱友人发刊报纸，激扬民气。先生撰《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》一文揭之报端。先生则还里，筹设孝义会，就深山废社说种族大义及中国危急状，听者累千人。环蕲春八县皆响应，众至数万。共推戴先生，称为黄十公子。

次年春夏间，先生奔走于武昌及鄂东诸县，谋聚义师。至十月十日（农历八月十九日夕），武昌倡义，先生与善化黄兴、广济居正、邑人田桐等会于武昌。武汉隔江相望，而汉口空无一卒。先生急倡渡江议，因举詹大悲主汉口分府事，于是武汉克复之讯遍国中。起义者接迹起，清廷乃命冯国璋率军南下，急争汉口。先生与黄兴、居正诸人亲赴前线视察，咸以新集之军不足当北军劲旅，谋令先生返蕲，纠合义师以捣其背。先生即还鄂东。义故闻风起，环蕲诸县如英、霍、宿、太、梅、济、罗、浠群雄杰少年皆聚蕲春，一呼而得二、三千人。未成军，乃有宵人白状于田家镇总兵，镇兵尚为清廷扼守斯处，即率军围剿。先生知不敌，乃纾道黄梅赴九江，适詹大悲以汉口陷亦至。九江军政分府主者阴忌先生与詹君等，先生乃走上海。未几，革命政府成立于南京。先生性不偶俗，未尝谋仕宦。癸丑冬，直隶都督赵秉钧延先生赴天津，以秘书长见诿，欲辞不得，强留两月，至次年春辞去。返沪以后，即一意撰述，并主上海《民声日报》。以外患日深，欲藉文字唤起民众，共图御侮之术。

先生生平虽处危难，犹不废书。辛亥以后，困居沪滨，时或羹粥不继，犹勤治故籍，祇于《广韵》一书，循回往复，无虑数十百遍，乃综合顾、江、戴、段、王、孔及章君所说，遂定古声十九类，古韵二十八部之目。自是亘古遗言，咸能推测，非但能得古人音读，即古义亦因以大明。钱玄同本与先生同居章君门下，亦精于声韵学，认为先生所定声类、韵类证据

确凿，可为定论，遂不用章君所定古韵二十三部，而改从先生之说。惟先生深自谦抑，尝谓吾于声韵，唯取前人所论，加以分析综合，已实无所有。又谓韵部分合，原不足争，今即依用段氏十七部之说亦无不可。

章君以受欺袁氏，于癸丑（一九一三年）八月入京，即被幽囚。先生两度入京省视，既感于章君所遇，因思立身之道，唯有以治学教人为报国自靖之具。故自甲寅秋，即受北京大学教授之聘（时年二十八岁），讲授词章学及中国文学史。讲义有《文心雕龙札记》、《诗品疏》、《咏怀诗补注》等。居五年。己未秋（一九一九年）还教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（武汉大学前身）。编《说文》、声韵、《尔雅》三《略说》作讲章，居七年。应北京师范大学聘。丁卯七月，先生长子念华以肺疾卒，先生哭之恸，欲迁地以塞悲思。念华性行和厚，能读父书，肄业于北京大学一年，歿时，才十九岁。秋后，先生赴沈阳，教授东北大学，居半年。戊辰春（一九二八年），应南京中央大学聘，讲章有《礼学略说》、《唐七言诗式》诸稿。居南京八年。乙亥重九后二日，以胃溃疡失血多而歿。计自甲寅以至乙亥，专隆教诲二十有一年。

先生生平嘉言懿行，年来及门诸子多有叙述，今仅就所知书于下方：

孝友淳深 立身贞固 先生素性孝友。自伤少孤，故每逢家祭日，念及先人勤劬恩德，辄流涕被面。事慈母田太夫人如所生，章君撰先生墓志，述及居京时食蟹羹事，称先生孝比茅容。有异母姊适黄安李氏，先生念其孤贫，迎养垂二十年。姊歿，为治丧具甚厚，并归葬原藉。乙卯（一九一五年）七月，袁世凯谋称帝，筹安会起，劝进者日数百。或欲罗致先生入会，先生严词拒绝，不为所污。其立身大节多类此。

刻苦为人 殷勤传学 先生尝言，人之生世，实为勤苦而生，不为逸乐而生；能于苦中求乐，方是真乐。又尝语晚辈：“汝见有辛勤治学如我者否？人言我天资高，徒恃天资无益也！”

先生在北京大学授课时，专讲文学。学生中如刘曠、孙世扬辈，知先生邃于小学，每夜造门请益，讲至深夜方散。居南京时，门人张文澍自平湖来谒，先生方病疟，即为讲年来心得，历半日不休，竟忘其病。万县有许仁者，曾未晤面，尝驰书问学。先生历告以治经为文及研究小学之术。其诲人不倦有如此。

博学以知服 先生博稽戴籍，然持论谦虚谨慎。尝言：“读古人书，自视欲然，如不识一字人。”儒行有言：“博学以知服”。此语无异为先生言。

先生与仪征刘君年龄相若，学术互有短长，又十余年昆弟交，徒以经学不如，一旦易友为师，自称弟子。刘君歿后，尝追称先师刘君不已。此非仅如韩愈所说：“道之所存，师之所存”，亦见其用心笃厚处，态度谦虚处。

疑事毋质 直而勿有 先生尝引《曲礼》中二语以教人，实亦自道之辞。今引先生说《尚书》一条，以明其笃守“疑事毋质”之义：“前儒有谓古文《尚书》孔传出王肃，实有不尽然者。如《益稷》篇之‘日月星辰’孔义及‘粉米黼黻’孔义，皆不同王肃。《禹贡》‘徐州，厥土赤埴坟’孔曰：‘土黏曰埴’而王同郑作‘戢’同读为炽。（见《释文》）此传不尽同王之明证。而皮锡瑞乃云：‘孔传多袭今文，由王肃兼通今文’惟此则不可解，疑皇甫谧辈又间有窜乱，或肃间为纇差。侃以为疑事毋质，孔传虽伪，毋为蔽罪于雍。”焯案：《尚书》伪孔传，前儒多云出自王肃伪造，及见其不合，又以为间出皇甫谧之手。余杭章君又以为出自郑冲。惟先生坚守疑事毋质之义，此其严谨处，亦为其闳通处。人谓先生兼有戴氏（震）之闳通与惠氏（栋）之严谨，而其文则又过之。所论至允。先生于声韵之学，集清儒之大成。然先生为而不恃，功成而弗居，尝言：“十九声之说，得之于新化邹君，二十八部之说，得之于武进刘君。”其直而勿有又如

此。

凡改易前文 必多方求证 先生云：“《广韵》十七‘真，侧邻切’（《唐韵》同）真軫震三音相承，軫震在照纽，真不得独在庄纽。且从真字得声之字，古皆在舌音，无作齿音者，《玉篇》‘真，之仁切’是也。《切韵指掌图》真为照纽三等，不误。軫韵章忍切，下有真鬻等七字皆从真声，以此知其一系。侧邻切，侧字疑作之。”（《广韵校语》）。又乙亥七月丁未日记云：“《北山移文》：‘驰烟驿路，勒移山庭。’山灵勒移于山，何故先言驿路？且驰烟驿路，语亦不可解。烟又不与移对。今案当作‘驰烟驿雾’。此二句合之，止是飞檄二字之意。雾讹为露，露又烂脱为路，遂不可解。王勃《乾元殿颂》‘绳幽驾险，驿雾驰烟’知所见孔稚圭文尚不误也。驰驿相对，故王勃《上武侍极启》又以‘驰魂雾谷’与‘驰思霞丘’句俪。”观此二条，是先生于前文虽确知有误，必得旁证，始作结论。

不轻改旧文 不轻驳前说 《诗·卫风·氓》“女也不爽，士贰其行。”王引之《经义述闻》以贰为贰之讹字。先生云：“此贰必非讹字。王说不可从。”又谓诗之六义，风雅颂为之体，赋比兴为三用，孔疏所说，极为明白，不必别立异解。

捷悟与苦思 先生读书多神悟，章君已言之。忆居南京时，日本吉川幸次郎来访，问疑义数十条，随问随答，其中间及《谷梁音义》“释旧作杀”“作啥”之文。先生曰“‘释旧作杀’者，释文旧本作杀云尔，此宋时校者之词，非陆德明本文。‘释旧作啥’同此解。”其论学多如此。先生于古书遇有讹脱难解处，往往苦思穷日夜，必得解始已。如《吕氏春秋·适音篇》云“太小收志嫌，以嫌听小，收耳不充。”高诱注：“嫌听譬自嫌之嫌”毕沅云：“注有误字，似本为嫌字作音，而后人妄改之。”先生历考《公羊》文十三年传及《诗·采薇》正义，《淮南子·原道训》诸文，证知高诱注当作：“嫌读群公嫌之嫌”。因记其后云：“此条讹文，盖仰思两昼夜而得之，校理旧文，亦何容易乎？”

为学务精习 先生阅书，必施圈点，虽卷过数百，必点完始已。歿前一日，吐血盈盂，以《唐文粹补遗》末二卷未毕，犹力疾圈点讫，始就榻。尝言：“余观书之捷，不让先师刘君，平生手加点识书，如《文选》盖已十过，《汉书》亦三过，注疏圈识丹黄烂然，《新唐书》先读，后以朱点，复以墨点，亦是三过，《说文》、《尔雅》、《广韵》三书，殆不能记遍数。”（戊辰五月三日日记）。焯窃观先生圈点之书，卷数当以千计，经史子文诸专籍无论已，即以《四库全书提要》、《清史稿》两书论之，即达七百余卷。至于能倍诵之书，不止如先生所述《说文》、《文选》数部而已，如杜工部、李义山全集，几皆能上口，即词曲中能吟讽者亦多，博闻强记，盖兼具所长。

观书敏捷 复能深入 壬戌（一九二二年）夏，取《文选》平点一过，每卷后皆记温寻时日，以六月二十四日启卷，至七月六日圈毕，为时不及半月。凡《文选》本文多加圈加批，即李善注亦兼施圈点。中如《文赋》、《离骚》等篇，皆详评细斲。其难解者，如任昉《弹奏刘整》一首，几于字字作解；凡不可解者，皆得解悟。

持论平允 不存门户之见 先生治经，以汉注、唐疏为主，然亦不慢宋儒。尝言朱子《四书集注》文字精洁。迥非清儒所能及。其与入书，谓养心制行，非问道于宋明儒先不可。近日读《宋元学案》一卷，对于生平行事，悔吝多矣。何术以晚盖，尚不能知也！

凡上所述，只就先生立身行己治学诸端撮取一二言之。至其爱国之深，关心国家安危之切至，人皆知先生不仅是驰名中外的学者，而且是具有高度爱国热忱的革命者。

先生是我国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，对于哲学、文学和史学的研究，都显出卓越的成

绩。去世已四十七年，后学每提起黄先生，仍是向慕不置。

章君尝劝先生及早著书，答以年五十当著以纸笔，不幸年未五十即下世。人见先生无遗书，并疑其无遗稿，实则批校笺识的书籍还存有百余卷。

先生对于整理古籍，在分章断句方面，极为重视。尝说：“学问文章宜以章句为始基，研究章句，就是研究小学。”他圈点《十三经》（白文本），除断句外，还加上许多符号，表明文内有多种不同的意义。他说：“《尚书》、《仪礼》两经，向来号称难读，《诗经》四字句多，人皆以为易读。其实，《诗经》句读，在音节和文义两方面应该区别开来。如《邶风·柏舟》篇首章‘微我无酒，以遨以游’二句，以文义论，当作一句读。《周颂·般》‘黶山乔岳，允犹翕河’二句，‘黶山乔岳允犹’六字宜为一句，‘翕河’二字为一句。”于是他把上句和下句用一种符号连结起来。还有其它许多表义的符号，这对读者有很大帮助。

先生对《说文》、《尔雅》、《广韵》三书，研讨极深，批语共达七十余万言。焯曾将《说文》识语抽出三部分编为《说文同文》、《字通》、《说文新附考原》三稿。《说文》讲词编为《说文段注小笺》，并将文字、声韵、训诂讲词编为《文字声韵训诂笔记》，《尔雅》笺识编为《尔雅音训》，《广韵》笺识编为《广韵校录》。他如《昭明文选》批点本编为《文选评点》。先生所为古今体诗达千余首，词四百余首，各编为若干卷，文一百余篇，分十三卷。还有历年日记十余册（逐写稿，不全）。就以上所陈，其最关重要者，为手校《十三经》白文和批校《说文》本。一九八一年以前，已将此书稿送交上海古籍出版社。社中同人本着上级领导关于整理出版古籍的意见，并为后学着想，为祖国文化事业着想，已决定将这类书稿影印行世。

先生所遗书稿还有笺识本和已经刊布而传播未广者，以及见于新旧杂志诸作，拟编为《量守庐群书笺识》及《黄侃论学杂著续编》二部（《黄侃论学杂著》已三度刊行）。焯年已逾八十，精力衰败，力图将此二书编成，以副后学之望。

一九八二年六月